

二十世紀中國美學研究叢書

汉语

语境中的西方美学

Han Yu Yu Jing Zhong De Xi Fang Mei Xue

安徽教育出版社

汉语

语境中的西方美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 / 牛宏宝等著.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丛书 / 阎国忠主编)

ISBN 7-5336-2679-6

I. 汉… II. 牛… III. 美学-西方国家-影响-美学-中国 IV. 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2897号

责任编辑: 张丹飞 何清华 装帧设计: 张鑫坤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30 000

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000

定 价: 21.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651321

邮 编: 230061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译事春秋	19
第一节 总体态势：三个阶段与两个高峰	24
第二节 地位变迁：比较西方、苏俄，透视西方美学 ...	47
第三节 杰出人物：各领风骚，影响深远	51
第四节 古今译著：消长起伏，主题变奏	58
第五节 美学门类：粉墨登场，形貌毕呈	67
第二章 “上手状态” —— 1949 年以前中国接受西方美学 影响的三重结构性倾向	80
第一节 把美学置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的总体倾向中	86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西方启蒙美学的 “视域融合”	99
第三节 以中国传统“艺术心性论”会解西方美学	114
第三章 康德在中国	138
第一节 个别观点的接受与整体的误解	139

第二节	被批判的和被融合的·····	169
第三节	开放的接受与融合·····	198
第四章	风云人物 ·····	220
第一节	克罗齐遭遇中国传统“艺术心性论” ·····	221
第二节	尼采：“文化激进主义”与传统 ·····	259
第三节	黑格尔的命运·····	309
第五章	借石成玉 ·····	361
第一节	在西方丛林中的建树 ——朱光潜《谈美》与西方美学 ·····	362
第二节	二分的西方美学 ——王朝闻《美学概论》与西方美学 ·····	371
第三节	广收巨纳 ——叶朗《现代美学体系》与西方美学 ·····	381
第四节	重立中心 ——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与西方美学 ·····	390
第五节	西学我用 ——李泽厚《美学四讲》与西方美学 ·····	399
第六节	意义反思·····	408
第六章	化装历史 ·····	412
第一节	何谓西方美学史·····	412
第二节	虚构的历史·····	425
第三节	压抑的文本·····	443
主要参考文献 ·····		454
后记 ·····		458

导 言

当《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这个标题呈现于读者面前时，就能从标题本身看出本书的主题：它呈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具体到美学领域的相遇。“汉语”在这里当然最基本的是指一种语言，但也指由这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西方”也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也指一种与汉语所承载的文化相异的另一种文化。任何承载着自身文化的语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而语境作为一个独立而且自足的结构，具有最基本的阐释功能，为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进入该语境的元素提供解释，并形成意义。任何异文化的东西进入这个语境同样必须经过这个语境的解释，方能产生作用。但西方美学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西方美学本身就携带着其自身产生于其中的文化语境的全部信息，而它的语境也同样是一个自足而独立的结构，具有它的基本的阐释功能。就此而言，“汉语西方美学”讲述的就是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即汉语语境如何呈现西方美学，西方美学在汉语语境中的遭遇，以及两种自足独立的语境相遇时所形成的深具阐释学意义的对话关系。

—

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于不同时期都受到了来自异文化的影响，如印度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整个

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在明清之际又有西方文化的逐渐引入，但总体来说，中国文化发展是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个文化的系统和结构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所以，当西方文化在其殖民拓展的“坚船利炮”的携带下逼近汉语文化的界域时，这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文化所受到的震撼和惊惧之猛烈就在所难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民族存亡的危机意识重压在整个民族头上，同时还有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而这个文化意识的危机就带有“影响的焦虑”的性质，虽然它比“影响的焦虑”远为深重和深刻。

远为深刻的一个方面在于，西方对世界的殖民拓展意味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即一种文化在相对固定和封闭的地域的相对独立和封闭发展的时代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文化冲突和交流并存的时代的到来。因此，在承担坚定地维护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铁和血”的使命的同时，也必须选择应对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战略。当时中国对这种危机意识中的“影响的焦虑”的第一个回应是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选择策略。这个文化选择的策略之所以立刻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反对，是因为这个策略本身的重点是站在封闭文化的立场上的。

第二个被选择的文化战略就是由王国维所表达的“学无中西论”。他说，思想上的事，不能“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因为中西之思想都是解释“宇宙人生问题”的，虽然各国的解释有不同，但“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争，只有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之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

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只手段，则庶几有发达之日欤？”^①他说，如果中国思想界能“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于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②。虽然他主张学术独立和以对真理的追问为核心，但目标仍是振兴中国学术和精神。王国维正是在这个“学无中西”的精神指导下，成为引进西方美学的第一人，也成为建立中国美学学科的第一人。

此后鲁迅先生又提出“拿来主义”的应对策略。无论是“学无中西论”，还是“拿来主义”，都表明了中国的卓绝有识之士在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时代，立足创造，吐纳一切的浩然之气和博大胸怀。1949年以后，这个应对策略则演变成了“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主张。虽然这个战略受到了极“左”的影响，但得到了坚持。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战略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

而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整体上开放的文化战略姿态下，吸收西方美学，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作为一独立学科的美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在西方美学的极大影响下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丰富的、发达的艺术和审美意识以及理论的总结，但未确立过作为一门有自己的确定的研究领域、适合本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规范以及范畴体系的独立的学科。美学作为学科的概念是王国维在20世纪

① 《王国维文集》第3卷，3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② 同上书第5页。

初从西方引进的，而在此后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它所走的每一步都打下了西方美学影响的深深印记。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近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也不会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也不会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它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之一。

当然在这个百年历史中，俄苏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近百年的中国美学史是西方美学、俄苏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本土审美文化资源四种主要力量的碰撞、对接、产生合力和对话的历史。但是西方美学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持久最广泛的。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给予了一个学科的名字，在学科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影响存在，而在如下的三个方面它的影响尤显重要和深刻：基本理论、美学方法论和学理规范以及最基本的范畴体系。而这三个方面都是一门学科构成中的奠基性方面，是它的躯体和筋骨，而西方美学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奠基性方面影响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更何况西方美学不仅以其丰富的传统在继续发挥着影响，而且它的最新的发展也成为今天中国美学关注的重点，而俄苏美学的影响在近 20 年处于消息减退的状态。

正是由于中国近百年来的美学发展，是在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下进行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便构成了这个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结构性特征，形成了这个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一条特殊的规律。我们认为，如果要总结中国这近一百年的美学史，而对这百年来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忽略不计，就不可能全面总结这段重要的历史。因此，要科学地把握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特征、发展规律和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就必须

正确地把握西方美学对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影响。

而在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百年来的巨大影响中，使本学科领域内深切感受到的是时而隐蔽、时而显明的巨大阴影，这就是“影响的焦虑”。

确实，由于这种影响力的巨大和深切，即使是以最开放的姿态来对待来自异文化的冲突和挑战，汉语美学界的学者们都同样深切地感受到了“影响的焦虑”。正如王尔德所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点东西。”^① 王尔德以简洁而含有苦涩的语句道出了“影响的焦虑”的本质内涵：在大师的影响下的自我的丧失，而这个丧失中既有自我个性的丧失，也有创造性的丧失，以及由此而来的失落感。而“影响的焦虑”之所以发生，在于影响者比被影响者获得了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权并对追问的问题已经优先有所言说。这个优先权不仅是时间上的占先，而且是在权力上占先的时候，“影响的焦虑”会变得更加。

确实由于这种影响的巨大压力，中国现当代美学学科中，曾经存在过中国传统有无美学的疑问；在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下，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论和基本范畴是以西方美学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范畴为主干的，而中国本土美学的传统丰富资源似变得失去了理论诠释的力量，正像有学者所说的得了严重的“失语症”。比如，在美学的范畴系统中，诸如悲剧、喜剧、崇高、主体、客体等主要范畴严格说来都是从

① 转引自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西方美学引进的，只有王国维创造的意境、情与理等极少数范畴是本土的；同样，在审美心理学的理论中，几乎全是由西方的审美心理学理论构成的，诸如移情、心理距离说、格式塔心理学等，而本土美学在这个领域几无贡献。正是这样的现状，在美学领域“影响的焦虑”变得异常苦涩和尖锐。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只要影响存在，总是有一个“焦虑”的层面存在，如果没有这个“焦虑”的层面，发生影响的意义就不会是很大的。因为，“影响”本身是一种影响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的关联域，在这个关联域中，只有影响者是一个有“优先权”的“他者”，“影响”方能发生，但也只有被影响者有足够的回应力，这种影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否则“影响”会变成对于接受者的自我的剥夺。也就是说，“焦虑”虽然是对于丧失自我和创造力的焦虑，但也正是这个焦虑，对于强健的接受者来说会转化为发展和创造的机缘。因此，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美学又可以看做是中国美学在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情况下，探索自我发展和在挑战的面前积极应战的努力。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反复咀嚼“焦虑”的苦涩，而是建立健全的“影响观”，对这个影响的过程和内在的规律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因而，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直接切入对于影响的分析：分析和总结西方美学对中国现当代美学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和规律；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美学在接受这种影响的过程中的结构性倾向和知识背景；它的显意识和无意识的方面；清理出中国美学在这种影响下自身发展的有效资源和生长根基，以便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为日益深入的文化冲突和交流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结果。

就此而论，“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这个标题，既涉及

西方美学是怎样以及如何被汉语语境加以“转述”的，也涉及西方美学怎样影响了中国美学。而无论是“转述”的层面，还是“影响”的层面，都本然的都是一个阐释学的现象和领域。

二

在我们最初对本书的主题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是把注意力放在汉语美学界如何和怎样“转述”和描述西方美学的。但当我们具体地进入这个“转述”的层面时，阐释和理解层面跃然而出，以其显明而确然的存在袭击我们，使我们对它的存在不能忽视。甚至于当我们涉及汉语美学界为何注意到了这样的美学家思想而对另外的美学家思想却视而不见这样的现象时，我们也发现即使在这样简单的事件中，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阐释学的层面，用存在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上手状态”。在这种“上手状态”中，重要的不仅是一个对象进入了视野，更重要的是使对象进入视野的同时也使视野本身得以显露。王国维最初何以对叔本华比对康德更为垂青？在这里面就存在着王国维使得叔本华进入他的视野，却本真地显露了他自己的视野。而这个视野就是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辞中所说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而当他把康德美学思想归结为“解脱”或“超脱”时，我们则发现他是以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解脱”意向来会解康德的“无功利的趣味性”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中国传统是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来描述这一阐释学现象的。但海德格尔对此的把握却更为深刻，他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

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释可以拿来当做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它是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①

因此，即使在看似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对西方美学的“述”的层面，也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纯客观的对“他者”的复述或“零度叙述”，而是复杂的、深具阐释学意蕴的现象。在这个阐释现象中，“转述者”并不是把自己先行具有、先行把握的“前见”消弭尽净，以一张白纸似的自我去纯客观地叙述他所感兴趣的“他者”，而是本然地携带着他的先行具有、先行把握的“前见”使“他者”到手；在这里，并不是“转述者”把自己清理成空荡荡的场地，然后使西方美学这个“他者”到场，以便“占有”他，而是“转述者”与“他者”同时到场，并在那里相遇。

与“述”的层面相对应的“影响”的层面，也同样是一个阐释学的“域”。在这里，也并不像通常所想的那样，是具有“优先权”的“他者”居于主导的、主动的地位，仿佛这个“他者”是一个征服者，就像凯撒那样宣布“我来了，我征服，我胜利”。情况恰恰相反。任何“影响”都是在影响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的，“影响”的有效发生，是影响者与接受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影响”必须建立在影响者的可取之处、有施加影响的优势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在接受者需要的、能够接受的基础上；一方面是影响者以其优势对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8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接受者施加启迪、规范、浸染甚至左右其动向的“力”，另一方面，接受者又依据其“前见”、自身固有的文化和知识背景对影响者施加选择、解释和创造性转化的“力”。显然，在这一阐释学的“域”中，并不是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影响者采取主动，被影响者全然处于被动，而是各有其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在这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对于美学学科所关注的问题的追问，是对于美学问题的追问把影响者和接受者勾连在一起。因此，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影响”不同于国际间的战争，它既是接受者对影响者的选择、解释、误读和创造性转化的复杂过程，也是影响者改变接受者的本土视界、以其“优先性”模塑接受者对美学问题的追问方式的过程。

正是在实际的分析中逐渐形成的这个基本的认识，使我们把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近一个世纪的影响看成是一场阐释学意义上的对话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场连续不断的对话的历史事件。它既是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的对话，也是中国美学家与西方美学家之间的对话，而无论具体进行对西方美学进行阐释、转述以及最后形成自己美学思想的中国美学家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他是在进行这样的对话。就其作为对话而言，汉语美学家和西方美学的文本之间的这种对话包含着平等和积极的相互作用。而使对话之所以进行的则是双方对于美学问题的共同追问，正是对于问题的共同追问把本来异在的双方聚合在一起，使他们彼此聆听对方的言说。

而在这个对话的关系中，对对话构成破坏的是这样两种态度：一个是拒绝进行对话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和“文革”期间对西方美学持一种全然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种态度是对于对话的拒绝，当然也就是对于聆听的拒绝。而正是这种拒绝对汉语美学的发展带来了恶果。另

一个破坏对话的态度就是力图在解释和转述西方美学的过程中，从所谓纯然“客观”的方法原则出发，把解释者的自我从本来是对话的关系中清除出去。在这种所谓的纯客观的“述”之中，被清除的不仅是解释者的自我，还有解释应有的创造性的方面。在这样的转述中，西方美学作为“他者”的他性以全然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这里解释者关注的是“他者”的他性，而不是对问题的追问。结果，造成的状况就是西方美学仿佛言说的过多，而解释者的创造性一面消弭不见了。汉语美学近百年来受西方美学的影响，有时之所以给人一种被西方美学完全侵占了地盘的印象，就是这种对解释者主体性的过分清除造成的。

正因为如此，在汉语美学界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近一百年中，只有那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与西方美学进行平等对话、并把对美学问题的追问作为自己与西方美学进行对话的扭结点的汉语美学界的学者的著作给汉语美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成果，也正是这样的著作经住了无情时间的考验，成为历史性的事件，并成为后来者发展的视野背景。

而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思考，使我们注意到了“影响”这个阐释学现象的一个更深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影响”。表面上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其实却是一个难度极大的问题。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或许别人早有发现——并不是所有本土没有而被引进的美学观念都会发生“影响”。这就像黔无驴，好事者船载以入，这驴却不会在黔这个地方发生影响一样。这个比喻可能过于尖锐，但对于问题的思考却具有启示性。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被引进的西方美学主张或个别观念，引进之日，也就是它的沉寂之时。比如西方 19 世纪末叶的实验美学，在“五四”前后曾被引入，但却很快就被

遗忘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能界定它的“影响”。贝尔关于艺术的定义“艺术是创造有意味的形式”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也同样被引进，但在那时它的影响却是很难确定的，它发生真正的影响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而美国美学家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一书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翻译过来之后，被汉语美学界谈论的时间非常短，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引证它。同样，在西方自己的美学史中被看得很重要的美学思想，却始终未能进入汉语美学界的视野。比如鲍桑葵《美学史》中所论及的 19 世纪末叶的夏斯勒和哈特曼等人的美学思想。

这种种现象使我们认为，并不是被引进就会发生影响，只有那些深深嵌入到汉语美学界对美学问题追问的基本理路、视野和思想结构中的西方美学思想和观念，才发生了真正的影响。而这种“嵌入”之所以可能，也同样是因为西方美学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某一个美学家思想中的某个方面与汉语美学界在美学问题的追问中形成了真正的对话关系。没有对话就没有影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来把握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影响的。这样，如果一种西方的美学思想被引进，但却依旧保持着其作为“他者”的“他性”，我们就认为这种影响还没有发生。因为它还未成为阐释的历史性事件。

三

论述至此，或许有人会向我们提出一个我们一直期待着的尖锐问题：在对问题的追问中，什么问题对追问者构成问题，什么问题能够进入追问者的视野，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追问者进行追问的“前见”的水平和情况，取决于追问者主体的构

成，而这种“前见”和阐释者主体的构成状况总是有限度的，那么这样一来，获得了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权”并对问题优先进行了言说的西方美学的最新发展如何才能进入发展相对滞后的汉语美学界的视野中，汉语美学界怎样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与西方美学的平等对话关系呢？

确实，这个问题曾经同样困惑过我们。

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我们认为，在阐释学的对话关系中，重要的并不是阐释者或接受影响者的视野和主体构成获得了与影响者同等的发展水平，阐释学对话中的平等必须是对美学问题进行追问的权力的平等，是对问题进行追问的独立性的平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在美学领域的对话才是平等的，才是自由的，才是学术独立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美学界才能对西方美学有所选择，才能在自己的发展路径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使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产生的是“影响”而不是文化侵略，才能保持汉语美学发展的独立性，才能在西方美学的极大影响下不丧失自我、不丧失自己最珍贵的事物，才能真正地解除“影响的焦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西方美学进行真正的对话，才能聆听西方美学文本对我们的言说，并在聆听中对问题本身有所领会。那种丧失对问题追问基本路径，丧失对问题追问的独立性，以“跟风”的方式企图保持与西方美学的“同步”发展的思路，只能导致自我的丧失，丧失汉语美学对问题进行追问并进行言说的“话语权力”。其实，阐释学对这一点的本然要求，已经给予那种“跟风”式的追随西方美学发展的思路以应有的矫正。因为在这近一百年引进西方美学的过程中，曾经流行过这种“跟风”式的学术引进，但这样引进的东西最后的结局是沉寂，而不可能嵌入我们所说的汉语美学对问题进行追问的思路和结构性的层